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进展

杨 卡

（国际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91）

[摘要] 我国学者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自1980年代开始兴起，1990年代以来逐渐展开。关于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集中在对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社会空间进行点式的研究和考察；城市化和人口的变动情况是我国城市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对于城市居民迁居行为的特征、因素和机制等的探讨已经比较深入和广泛；近年来，我国关于城市贫困群体和贫困空间的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对于更深层次的贫困产生机制和应对措施的论证有待深入；针对特定群体的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老人和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研究。

[关键词] 城市；社会空间；地理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9)03-0081-06

我国自建国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社会地理一直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任务巨大，人文地理的主要学者都投入到了与经济建设关系更密切的研究领域，对于城市社会地理只有少量的关注。根据张小林等的总结，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期间，我国社会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地理、社会集团、贫困问题、犯罪地理、城市社会区等有限的领域。[1](P.118)

自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国外相关研究资料的引入，更多的学者开始涉足城市社会地理的研究领域，关注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会区研究，市民的购物休闲等行为空间研究，城市居民的迁居行为和住房空间研究，关于特定群体的社会空间行为特征的研究，以及关于居民的生活质量的研究等方面。

一、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我国的学者从1980年代末逐渐介入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最初的研究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城市社会空间的简单描述上。许学强等于1989年采用因子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广州市的109个小区进行数据提取和分析，将广州市分为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干部居住区、工人居住区、农业人口散居区和知识分子居住区等五个社会区，并指出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原因为历史因素、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和分房制度。[2](P.385) 1995年郑静、许学强等人提取城市开发进程、工人干部比重、科技文化水平、人口密集程度和农业人口比重等因子，把广州市区划分为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混合工人居住区、以交通通讯业为主的聚居区、农业人口散居区、干部居住区、知识分子居住区和以移民为主的新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发区等七类社会区，并将广州市 1990年社会区空间结构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城市规划、住房制度、城市发展历史、城市自然背景等 5个主要因素。这两次研究均从因子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各种因素进行主成分提取来划分社会区，从直观上描述了广州市的社会空间形态。此后顾朝林、吴骏莲等也采用因子生态学角度分析了北京和南昌等地的社会空间状况。

关于城市社会空间的另一类研究，集中在对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和分化趋势的探讨。柴彦威以兰州市为例，分析了单位制在我国城市内部空间中的作用，指出单位制的影响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修春亮、李植斌等认为一方面单位制的作用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家庭结构因素和居民的择居行为等的作用不断加强，并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城市居住区的分化，使居住区的组织形式进一步趋向复杂。顾朝林等认为城市职能的重新定位、外资的引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大量流动人口的介入也是社会极化的动力机制。吴启焰、崔功豪认为我国城市出现社会分化和居住空间分异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城市社会经济的转变、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的变化、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以及住宅自有化过程。但是 1990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结构性因素上，对于家庭和居民个体的深入考察在此之后的研究中才逐渐丰富起来。

2000年，出版了王兴中等人编著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城市居住分化模式、社会区域形成空间相互作用原理、社区分类与方法、社区生活质量与土地利用关系，以及社区空间结构与社会问题治理和管理等问题。吴启焰以南京市为例进行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居住空间分异是社会阶层分化、住房市场空间分化与个人择居行为交互作用的空间过程与结果，并据此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历史、机制和模式进行了总结。杜德斌等对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化与居住分异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

顾朝林等指出，经济社会和种族状况对社会区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土地利用强度和家庭状况构成社会空间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刘长岐认为影响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微观因素包括住宅价格、交通便捷度、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家庭构成、家庭收入和居民社会属性等内容。杜德斌认为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按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而分化。

尽管如此，我国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我国某些城市的社会空间进行点式的研究和考察。而我国的城市发展过程、城市空间扩展的模式都同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城市社会构成也明显区别于西方城市，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的城市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出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和演变的主要途径和规律，形成符合中国城市空间和社会特征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二、市民行为空间研究

柴彦威指出，我国居民生活的最基本组织是单位，通过对单位的考察，指出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三个层次：由在世界城市地域中独具一格的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同质单位为基础形成的低级生活圈；以区为基础形成的高级生活圈。

柴彦威、李峥嵘、刘志林等人对大连和深圳的居民日常休闲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城市居民周末休闲活动以消遣型为主、以家庭为中心开展，户外休闲活动以散步、去公园游玩和走亲访友为主，随年龄增长户外休闲活动发生率减少、随教育程度提高户外活动发生率增加，不同性别不同职业阶层户外休闲活动的发生率差异较大。深圳市的居民休闲活动集中在距离自家 0～5米的区域内，其中距自家 1公里这一相当于社区的空间范围，是深圳市民最为重要的外出休闲空间。休闲活动受到居民个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的制约。其中，影响居民经济实力的家庭收入及决定个人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性别与年龄因素是市民休闲活动空间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居民消费行为研究方面，魏金荣等研究指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居民消费行为受商店的品种、消费者居住地与商业中心的距离、商业中心的交通状况、商店的信誉与出售商品的质量、商品的价格、商业营业员的服务态度等微观因素的影响。张文忠等对哈尔滨市的分析表明，消费者购物空间的选择主要与商业中心的规模、交通方便、距离最短原则有关。王德等从消费者购物出行角度研究了上海市商业空间结构，认为上海市商业空间结构具有等级序列明确、空间分布不均和强中心线型结构的特征。王兴中等认为商业性场所微区位研究呈现出以文化生态透视、社会空间透视和马克思结构方法透视为主的综合性区域理论趋势。

仵宗卿、柴彦威等以天津市和深圳市为例，指出城市居民购物频度与购物出行距离呈负相关；不同类型商品购物的空间圈层结构；不同属性居民在购物行为上的差异性明显等特征。柴彦威等人还研究了深圳市居民购物行为的空间决策因素和居民夜间消费活动的时空特征，指出深圳居民的夜间消费活动普遍比较活跃，但平均消费时间并不长，消费频率较低，夜间消费深夜化现象并不明显。夜间消费活动表现出明显的随距离衰减现象，并且形成居民夜间消费活动的圈层结构，即 1 ㎞圈层的基本空间、5 ㎞圈层的主要空间和 10 ㎞圈层的日常空间。另外，不同夜间消费活动类型的空间分异也比较显著，形成夜间购物（平均距离为 2 ㎞）、夜间餐饮娱乐（平均距离 3 ㎞）、夜间体育健身与商务应酬（平均距离 3 ~5 ㎞）的空间结构。通过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研究，柴彦威等人指出，几个城市的老年人购物活动随距离呈现不同形式的衰减，小区级商业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可达性程度直接决定了老年人购物空间的收敛程度。张文忠等对北京市的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居民属性与消费者消费区位偏好和区位决策行为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出行方式、购物出发地点等个人和家庭属性对居民消费区位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居民对商业环境的满意度的评价水平显著影响着居民消费区位决策。其中，停车场、服务质量、商业配套设施是影响居民消费区位决策最重要的因素。

自 19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行为空间的研究逐渐兴盛，包括不同城市的购物、休闲等各类日常行为的考察，同时也借鉴了社会学的一些手段，使得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更加丰富。西方的研究视角已经扩展到城市形态、空间结构、交通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空间的相互作用上，我国目前研究的关注点还集中在日常活动设施和居民本身特征上，有待进一步扩展。

三、城市住房与迁居研究

西方关于迁居的研究早在 1970年代就开始丰富起来，我国关于城市居民迁居行为的研究从 1990年代后期开始起步。早在 1980年代，唐子来和朱介鸣率先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住房及其外部环境对迁居和人口分布的影响。

（一）迁居主体的研究

周一星等通过对北京市 1000户新房迁居户的调查指出，中青年已婚的核心家庭是北京市迁居户的主体，户主主要从事第三产业。史中华等人对深圳市民的研究表明，迁居者的特征表现为以两代家庭为主（占 55.6%）、以中高收入家庭（54.5%）为主、以中年市民为主（50.4%集中在 31－40岁的年龄段）和以白领阶层为主（63.4%）的特征。李思名等通过对广州和北京的居住流动进行分析指出，居住流动峰值年龄比西方市场化国家偏后；生育子女对居住流动的作用很小；不同性质的单位职工居住流动概率不同，股份制企业员工最高，其次为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员工，最低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员工；住房权属对居住流动的影响显著，自置房屋者迁移概率相对较低；房改房住户居住流动概率低，除非放松限制房改房上市政策，原有单位制社区才会彻底瓦解。易峥指出，我国居住流动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社会阶层高的人群流动性更高。

（二）关于迁居因素的考察

李铁立在对北京市的研究中指出，不同住户群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体在对居住区位进行选择时，所考虑因素的重要程度又不相同，而居住选址行为将导致北京市居住分异，进一步形成新的城市住宅格局。居住流动的目的不完全为了调整住房需求；易峥认为改革开放来影响中国城市居住流动的因素主要为家庭生命周期、结构性因素、个人社会经济状况等；居住主要向城市的新城流动，外来人口也主要集聚在新城区。

陶小马等通过对上海市的白领阶层的调查指出，收入低于 3000元者偏好于市中心以外房价较低的区位，当居民月收入超过 3000元时，购房因素中房价因素让位于社区环境、生态环境和交通因素，月收入 7000元以上者对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因素的考虑。

刘旺、张文忠以万科青青家园为例，指出在微观居住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属性的群体趋向于选择相同的居住区位，社会经济属性的作用和居住分异现象在居住区位选择中开始凸显；受房价和经济实力的约束，年轻型家庭居住区位的选择方向已向郊区外移；对于有子女的家庭来说，教育资源的丰富与否则是居住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的通勤时间对居住区位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原居住地、消费观念和信息搜寻等对微观居住区位的选择具有一定影响。

（三）关于迁居空间的研究

周春山以广州市为例，指出当时我国大城市人口以单位分房主导的被动迁居为主，且迁居呈短距离、蔓延式向外扩散。在市场经济下，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代表的市场力量是研究住宅区位形成的切入点，还应将居民择居行为和城市国土、规划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综合起来。周一星等通过对北京市的调查指出：1990～1995年间北京市的近郊区成为人口迁居的净流入区，中心区为净流出区；迁居距离 50%集中在 5公里以内，超过 10公里的不足 11%；迁居的主要动力是改善居住生活空间，迁居后的平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一倍。

受多核心组团式城市内部结构模式的作用，深圳市民迁居空间以在市辖区内部迁居为主；受地域空间特征差异的作用，深圳市民迁居特征的空间差异较大，尤其以特区管理线内部与外部地域之间的差异显著。居住主要向城市的新城流动，外来人口也主要集聚在新城区。

居民对边缘城市认知程度和主观评价会直接影响其迁居意向，对迁居目的地比较熟悉的居民和对迁居目的地的设施服务评价高的居民最有可能成为新兴边缘城市未来的居民；与新兴边缘城市之间存在经常性和稳定性联系的居民表现出较强的迁居意向，而联系较弱的居民迁居意向较弱；居民从母城迁往新兴边缘城市而产生的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离是居民迁居新城区的最大障碍。[3](P5)朱熹刚等以南京市为例，指出南京城市绅士化的特点主要是主城内原有分散的高收入者与新生的城市高收入阶层的内城再集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心区产业结构的转型、政府的政策引导、市民的择居观念与行为等是推动当前南京城市绅士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城市化和人口的变动情况是我国城市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的迁居行为的特征、因素和机制等的探讨已经比较深入和广泛，已经有了针对很多城市的研究和探讨。但是由于数据的局限，以及城市行政区划的变动，我国学者在获取城市人口变动的更详细特征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较少从人口的生命阶段、家庭周期、社会阶层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迁居行为考察和研究。

四、贫困群体及其生存状况研究

张茂林、张善余、唐钧、慈勤英、肖文涛、刘玉亭等人较早的对城市贫困的概念和界定标准进行了论述，指出贫困是一个综合的、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时代将具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刘玉亭等通过对南京市城市贫困群体的日常活动空间的考察指出，贫困群体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狭小，时间分布琐碎，以住所为中心的居住区成为城市贫困群体安身立命的主要场所和生存空间。陈果等指出，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王砥、朱世宏指出我国新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亏损企业和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老职工、社会无业人员和部分农转非人员、原有的社会救济人员。苏勤、林炳耀指出，我国新城市贫困问题产生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轨的特殊时期，以下岗、失业人员、流动人口和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新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产生将会对城市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刘玉亭指出，城市贫困人口在邻里层次上的集聚，导致三种类型低收入邻里的产生：老城衰退邻里、退化的工人新村和农民工集聚区（城中村），并认为这些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源于国家导向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国家福利住房供应制度。

从国内对贫困的研究可以看出城市边缘区和新城是城市贫困聚集的主要区位，也是流动人口聚集的主要区域。贫困群体是弱势群体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发布年度的收入、贫困和健康保险报告，对贫困人口和区域进行监控和统计，学者们的研究也开始转向社会文化因素、结构因素和社会经济根源方面的探讨。近年来，我国关于城市贫困群体和贫困空间的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对于更深层次的贫困产生机制和应对措施的论证有待深入。

五、城市生活质量研究

自 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城市生活质量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王兴中等人认为，城市生活质量的实质是对城市生活行为资源的获取过程。从国内对城市生活质量研究的丰富程度来看，具体的研究可以概括为 1980年代已有研究，1990年代中期开始广泛展开，2000年以后研究更加丰富。从国内对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都着意于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对相关城市的总体评价。

1985年林南等在研究中指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张蕾、郭娜指出，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1990年代初，韩淑丽等人就对生活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探索。刘玉玫曾建立过相应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经济与城市化、物质生活、生活环境、精神生活和居民素质五个领域的30个指标。程丽辉等在对西安的研究中采用了经济状况、住房条件、健康水平、交通状况、教育水平、社会治安、气候条件、娱乐设施和艺术水平等九方面指标。

1996年之后，一些研究者对城市居住环境的研究加入了主观因素的评价，建立了更详细的满意度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范柏乃初步构建了收入、消费、教育、居住、健康、生活设施、文化休闲、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共 10个领域 30个指标组成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并运用该评价体系对我国 31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实际测度，按照测度值将这些城市的生活质量划分成不足型、满足型和优质型三类。

我国针对特定群体的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老人和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研究，以及一些针对城市青年、学生和教师等群体的生活质量研究。这些研究还并不丰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所决定，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逐渐得到关注，2006年以来对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研究工作逐渐增多。2006年，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刘晋洪等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对深圳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他们指出深圳市的农民工在个人关系、社会安全保障、经济来源、交通条件等 10个方面均低于常模，但精神支柱和个人信仰水平较高。虽然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研究还很不成熟，但各方面学者对其关注正在加大，这必然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热点。袁缉辉、张钟汝、许淑莲、刘晶等对老年人生活质量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齐英艳指出我国现阶段青年生活质量主要受经济收入、居住、就业、健康、受教育水平、婚姻家庭和休闲等七个方面因素影响。

香港学者对生活质量的关注较早，呈现了许多对生活质量影响因素、香港现有生活质量状况以及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建方法的研究。另外还有涉及到老人、学生、教师、贫困家庭等特殊群体生活质量的研究，例如 Sai Leung Ng 针对香港的 500 名高校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基本上满意，其中交通、环境质量和公共事业是甜美评价生活质量的最基本因素。

生活质量既是对一个社会中人们总体生活水平的综合描述，同时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西方的生活质量研究分为医学方面的个体集合研究和城市、区域的群体生活研究两方面，其中后者是城市学者所关注的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研究的内容。而西方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和衡量主要有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两种来源，研究的内容虽然也集中在城市生活质量的评价与衡量、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以及特定群体的生活质量等方面，但其研究的范围却比国内广泛很多：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中采用了更多的主观衡量因子；对于影响因素的考察也涉及到社会结构、城市形态、人口特征、社区的机构和组织情况、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而我国还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济社会因子的考察上。因此，在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更广泛的影响因素，并建立能充分体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才能让生活质量研究贴近城市生活改善的目标。

通过对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梳理和现状总结，笔者认为 1990 年代以来逐渐兴盛起来，逐渐填补了随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些研究空白，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是由于起步较晚，至今为止研究的内容还很有限，主要集中在社会空间结构、市民行为空间、迁居行为和居住空间、以及生活质量衡量等方面。与此同时，对这些有限内容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主要是借鉴国外的一些既有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我国城市进行探索。研究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北京、南京、广州、西安等有限区域，而且主要是以这些城市的主城区为整体进行研究，并没有在更大区域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也很少有对城市内部的特殊区域进行单独的研究。因此，我国社会空间的研究结果也很少能够梳理出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规律化特征，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小林，金其铭，陆华．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综述[J]．人文地理，1996(11).

[2] 许学强，胡华颖，叶嘉安．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J]．地理学报，1989(4).

[3] 翁桂兰，柴彦威，马玫，王新风．大都市区居民对新兴边缘城市的认知与迁居意向——以天津大都市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3(4).

(责任编辑　如月)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